

转载需注明出处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6期

启蒙的理性重建

——论卡尔纳普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

郝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卡尔纳普的科学人文主义致力于在新时代理性重建启蒙的人文理想,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通过批判神学和形而上学世界观, 理性重建肯定人性自律的科学世界概念; (2) 通过清除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残余, 理性重建科学自治的主张; (3) 通过消解传统习俗中的道德偏见, 理性重建倡导生活自主的科学人生观。卡尔纳普的科学人文主义捍卫了人性的自律, 推进了人类心智的启蒙, 为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对话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 卡尔纳普 逻辑经验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 启蒙 理性重建

(中图分类号) N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63 (2009) 06-000 -

卡尔纳普是维也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与石里克等哲学家共同创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学说, 为20世纪科学哲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卡尔纳普来说, 科学人文主义不仅是他的信仰, 而且也是推动他展开哲学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与其他维也纳学派成员一样, 卡尔纳普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他的科学人文主义深深扎根于倡导科学、民主与进步的启蒙精神之中。然而, 卡尔纳普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面临着向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屈服的危险”(1), p. 3)。作为关注社会文化现实的左翼维也纳学派成员, 卡尔纳普并未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逻辑的冰峰”, 而是积极吸收数理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运用分析哲学的技法, 以科学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理性重构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纲领。理性重建启蒙的人文理想, 是卡尔纳普赋予科学人文主义的重要使命。

一、卡尔纳普的“科学世界概念”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关注人和人的经验, 但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对“人”和“人的经验”的不同理解, 派生出种种不同的人文主义。(2), p. 27)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人文主义力倡科学的“世界概念”(Weltanschauung), 由此强调其科学导向, 从而区别于以形而上学为根据的德国“世界观”(Weltanschauung)。(3), p. 14) 对维也纳学派来说, 反形而上学的确凿有据的研究与启蒙精神紧密相关。(4), p. 301) 反形而上学的科学世界概念, 可追溯至启蒙哲学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之中。

正如蒂利希(Paul Tillich)指出, 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肯定人性的自律(autonomy)。人的自律是相对于“他律”(heteronomy)而言的。在他律状态下, 人类疏离于自身的理性, 服从宗教或政治宗派的异己权威, 缺乏独立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启蒙运动则倡导人类摆脱未经理性批判的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 独立运用理性和科学知识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在启蒙精神的普照下, “审美的实现(艺术作品)、认识的实现(科学探索)、在成熟人格中个人的实现、在正义原则中社会的实现等等所依据的律则, 都属于理性, 并以在每个人理性之中的自律为依据。”(5), p. 287)

启蒙精神倡导的“人性自律”, 相当明显地体现于卡尔纳普的科学人文主义之中。卡尔纳普在思想自传中, 将自己持有的科学人文主义大致概括为如下三个基本立场: “第一, 人类并没有超自然的保护者或敌人, 因此, 做任何可以改善生活的事情是人类自身的使命。第二, 我们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避免许多今日遭受的痛

科学文化

科学技术史

科学哲学

科技与社会

科技中国

科技政策

科学人物

专题

读书评论

通过最终基本上改善个人、团体乃至整个人类的外在和内在生活处境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第三，所有深思熟虑的行动都以有关世界的知识为前提，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最佳方法，因此，科学必然被当成改善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6），p. 83）

卡尔纳普科学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勾勒出了他信奉的科学世界概念的重要特征：首先，并不存在上帝或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人类无法依赖于异己的宗教权威来获得解放；其次，人类不得不依靠自身的能力来改善生活，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危机；最后，人类的理性以及通过理性获得的科学知识，是改善人类生活，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兴盛的最有效的手段。显然，卡尔纳普的科学世界概念，与启蒙运动倡导的自律精神一脉相承。

然而，卡尔纳普的科学世界概念也绝非是对启蒙自律精神的简单复兴，事实上，在卡尔纳普所处的德奥文化中，肯定人性自律的启蒙精神面临着颇为棘手的困境。康德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哲学中突出体现了德国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康德一方面将“启蒙”界定为“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号召人类“要有勇气来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但另一方面，他又出于道德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考虑，将世界区分为可知的“现象”和不可知的“物自体”两个领域，用形而上学为各种非理性权威保留了栖身之地。新康德主义学派继续推进德国的启蒙运动，试图进一步清除康德遗留下来的形而上学。然而，到了19世纪末，李凯尔特（Rickert）等新一代康德主义者开始崛起。这代新康德主义者“虽然没有失去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但是他们更为关注复兴康德对科学的形而上学预设的强调，赫尔姆霍兹将他的知觉生理学视为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座桥梁，新生代的康德主义者却希望限定自然科学的主张，并探寻人文科学不同的方法和标准”。（（7），p. 20）新一代康德主义者在限定自然科学知识主张及其有效性的同时，也削弱了人类独立依靠自己的理性解决问题的信心。

卡尔纳普在鲍赫（Bruno Bauch）的介绍下，认真研读过那托普（Natorp）、卡西尔和李凯尔特等重要新康德主义者的论著。（（8），p. 6）卡尔纳普敏锐地意识到，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德国唯心论哲学正在撼动推崇科学与人性自律的启蒙精神的基础，它们复兴形而上学的努力，是20世纪初在德奥文化中盛行的反科学与反理性思潮的重要根源之一。要在新时代捍卫启蒙理想，就需要彻底反对形而上学，重构“科学的世界概念”。相应于科学人文主义的三个基本立场，卡尔纳普理性重构的“科学世界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彻底贯彻启蒙运动反形而上学的主张，倡导宗教宽容，反对神学教条。启蒙思想家虽然反对形而上学，但仍把形而上学当成是一种假的或不确定的知识。卡尔纳普认为，从认知的角度看，包括思辨形而上学、规范哲学和价值哲学以及实在论在内的“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9），pp. 60-61）卡尔纳普否认形而上学在认知上有意义，这绝非源自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傲慢，而是源自他捍卫信仰自由的人文关切。卡尔纳普清楚地意识到，倘若形而上学要保留它作为一种知识的身份，那么必然有真有假。于是，不同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异，也就成为必须要克服的矛盾。而由不同形而上学支持的世界观或宗教信仰之间，也就产生了彼此斗争和迫害的嗜血冲动。这与倡导宗教宽容的启蒙精神显然背道而驰。为了避免宗教或政治上的党同伐异，卡尔纳普宣称，形而上学只是用来“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10），33）人生态度是多样的，形而上学及其支持的宗教信仰也就应该是多元的。将形而上学限定于情感表达上的意义，会有助于不同教派宽容地对待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避免无谓的教派纷争。

可见，卡尔纳普反形而上学的激进立场，与其反对宗教迫害的人文立场紧密相联。卡尔纳普虽然生长于一个虔诚的家庭，但是，他母亲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是自由开明的，“宗教的精髓并不全在于接受某些信条”，而在于“严肃地追求真理”，并“奉行一种善良的生活”。（（6），p. 3）因此，宗教宽容从小就深深扎根于卡尔纳普的心灵。成年之后的卡尔纳普在“一元论者同盟”运动领袖海克尔与奥斯特瓦尔德的论著的影响下，放弃了宗教关于世界、人和上帝的教义。卡尔纳普承认，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它的普遍存在有着历史的和心理学的的原因。因此，任何企图强制剥夺教徒信仰自由的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但对于神学来说，它是古代思想的残余，与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格格不入。神学仅仅是诸多形而上学理论汇集而成的体系，并不反映生活价值和生活习惯。（（6），pp. 8-9）神学若和形而上学一样具有知识的地位，那么，就容易以真理之名迫害异己。要让人类能宽容不同的信仰，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就需要从现代社会文化中彻底清除神学教条。因此，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卡尔纳普批判海德格尔等带有宗教背景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其动机远远超出纯粹的哲学旨趣。事实上，卡尔纳普将他的哲学工作看成是“一场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11），p. 21）

第二，肯定人类理性的能力，积极结合新发展的数理逻辑来清除形而上学，破除传统文化教条。启蒙思想家大多数是根据形而上学与科学知识的矛盾来批评形而上学，然而，与形而上学矛盾的科学知识，总是特定历史中的理论和假说，它们本身可能在将来的科学发展中被证伪。因此，这类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形而上学的权威。康德洞悉到上述反形而上学策略的缺陷，转而试图从人类认识的限度出发来限制形而上学，但仍为形而上学保留了避难所。在卡尔纳普看来，无论是经验科学还是认识论批判，都不足以真正完成反形而上学和捍卫人性自律的启蒙使命，而由弗雷格和罗素发展的现代数理逻辑，则为完成上述任务带来了新的曙光。卡尔纳普主张，形而上学由没有意义的伪陈述构成。然而，无意义的伪陈述从表面的语法结构上看常常貌似有意义的陈述。借助数理逻辑的语言分析，可以揭示形而上学陈述真正的逻辑结构，充分暴露出形而上学脱离人类经验，违背逻辑要求的真实面目，从而在根本上消解形而上学的认知意义和知识权威。由此，逻辑分析就有希望彻底完成启蒙遗留的反形而上学使命。

卡尔纳普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并不只是批判性的，而且还意图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观。他认为，在形而上学支配下的传统哲学假装研究事物的“隐秘原因”或“本质”，然而，有关事物的知识性问题，科学都可以解决，并不存在比科学知识更“高”的哲学知识。哲学所能做的，不是在科学之外提供有关事物的更多或更深刻的知识，而是对不同科学中的概念、语句、证据和理论做逻辑分析，从而澄清科学语言的歧义和暧昧。因此，卡尔纳普倡导以“科学的逻辑”来取代传统的哲学。“科学的逻辑”中的“科学”，指的是现今“已得到承认的语句整体”，它不仅包括“科学家的论断”，还包括“日常生活的论断”，“因为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界限。”（（12），p. 46）可见，基于科学与常识的连续性，卡尔纳普的“科学的逻辑”将生活和文化常识也纳入研究视野。“科学的逻辑”常被学界误认为是一项只关注逻辑和科学的事业，但事实上，卡尔纳普以及他归属的左翼维也纳学派的兴趣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他们积极运用“科学的逻辑”来清扫大众文化和日常语言中的传统迷信和思想教条，试图理性重构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语言和文化。（（13），p. 16）对日常生活方式的

理性重构，也是“科学的逻辑”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目标。

第三，以“统一科学”的方式理性重构现代文化，促进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统一科学的尝试可谓源远流长，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将之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然而，正如弗兰克指出，“统一科学”自18世纪的启蒙哲学以来，总是和机械论的形而上学如影随形，对于启蒙哲学来说，“或者放弃科学统一，或者将形而上学命题引入科学。”（〔14〕，p. 225）卡尔纳普也认为，正是因为启蒙哲学没有放弃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才导致其“统一科学”被形而上学的教条束缚，非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阻碍了新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逻辑一方面清除了形而上学的教条，另一方面又为科学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在卡尔纳普看来，统一科学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交流障碍。要克服诸学科交流的障碍，就有必要利用逻辑的方法，建构一个中立的形式符号系统，借此翻译不同学科和文化的概念与命题，使其能清晰准确地相互沟通，从而有效地从相关思想资源中获得解决本学科问题的灵感。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建构了一个统一的科学概念的构造系统，该系统以不经任何中介而被直接经验的“所予”为基础，按照心理对象、物理对象和精神对象的顺序，逐层展示了有关“所予”的底层概念构造高层学科对象、概念和原理的过程。精神的对象指的是“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对象。卡尔纳普指出，虽然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诸多差异，但它们与心理对象和物理对象还是存在着可构造的关联：精神对象总是以某个社会群体为载体，社会群体是具有心理倾向和心理过程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对象总是通过特定的心理倾向或心理过程而显现出来。另一方面，精神对象又以文物或记录为载体，文物记录是物理对象，因而，文化和历史的精神对象也要在物理对象中显现自身。卡尔纳普指出，精神科学的任务并非探求诸如“精神对象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确定个别的精神对象是通过怎样的行为（物理的和心理的行为）表现、显现出来的”。心理对象、物理对象与精神对象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的关系，表明了人类认识对象领域的统一性，从而可根据同一基础构造出所有的对象。（〔15〕，pp. 42-43）

既然精神科学的对象可被物理和心理对象构造出来，那么，完全可以认为，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人类经验能对现代文化的重建带来启发和帮助。卡尔纳普的统一科学思想也确有此意。在石里克的建议下，卡尔纳普特地以*Aufbau*来命名“概念系统的构建活动”。作为一战后的重要文化口号，*Aufbau*意味着理性地重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哲学和美学的世界。（〔16〕，p. 17）卡尔纳普借助科学和逻辑来重构启蒙文化理想的抱负由此表露无遗。然而，由于世纪之交科学革命的冲击，启蒙运动按照牛顿物理学范式确立的科学形象已显得缺乏说服力。要以科学的世界概念来重构现代文化，就需要重构启蒙运动信奉的科学形象。

二、卡尔纳普对科学的人文理解

启蒙运动对自然科学抱有普遍的热情，牛顿经典物理学成为科学的典范。牛顿的自然哲学思想被启蒙文化视为重新恢复秩序和确定性，在哲学家之间不同的意见和永无休止的争论中胜出的有效手段。（〔17〕，p. 202）牛顿力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以及相应的机械自然观，自诞生以来的二百多年来，“一直都是近代科学以及经过启蒙时代洗礼后的人类的普遍信条和常识（*communis opinio*）”。（〔18〕，p. 2）相应于启蒙运动对人性自律的肯定，启蒙运动倡导科学的自治，反对教会和政治的武断干预，极力为科学研究争取自由发展的空间。科学的自治在卡尔纳普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中也占据着核心的位置。然而，卡尔纳普认为，启蒙运动对科学自治的主张一方面太弱，另一方面又太强，启蒙运动科学自治的主张有待重构。

启蒙运动科学自治的主张之所以太弱，是因为它不自觉地将牛顿机械自然观的形而上学混淆于科学本身，常常引入类似“以太”的神秘实体来误导科学研究的方向。卡尔纳普认为，启蒙运动对牛顿的盲目崇拜，使其普遍无批判地接受了牛顿力学中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等形而上学概念框架和机械自然观的形而上学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以马赫和彭加勒等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对经典力学的形而上学概念、原理以及机械自然观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批判。（〔19〕，p. 99）爱因斯坦引发的物理学革命更有力揭露了机械自然观的形而上学本性。卡尔纳普欣喜地看到：“主要由于马赫、彭加勒和爱因斯坦的努力，物理学基本上已在实践中解除了形而上学的束缚。”（〔20〕，p. 174）卡尔纳普结合20世纪科学革命的成果，重构科学自治的主张：从否定的意义上讲，需要克服牛顿崇拜，运用新逻辑的分析工具和思维经济原理的理论利器，清除经典力学蕴含的形而上学遗迹；从肯定的意义上讲，需要将科学研究真正彻底奠立于人类的经验和理性能力之上，人类的经验以及用于整理经验的理性，是检验科学合理性的根本依据，也是科学研究抵御科学外的文化习俗武断干预的重要保障。

然而，启蒙哲学常常认为，科学中的观察经验是被动的，它中立于一切理论框架，并为科学理论的选择提供了超越历史文化语境的普适性根据。这种观点虽然正确肯定了人的经验对于科学的重要性，坚持了科学的理性自治。但这种理性自治的主张过于强硬，忽略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复杂而精微的关系。卡尔纳普对观察经验的理解并没有那么狭隘。卡尔纳普认为，科学家并不是被动地“等待自然界提供情况给我们观察”的旁观者，而是按照他心中的理论预期积极设计实验来探究自然，而实验将“产生出比我们在察看自然中所发现的东西更好的观察结果”。（〔21〕，p. 42）因此，实验中的观察所给出的结果，并非纯粹的经验材料，它往往受科学家先前的理论假设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科学家主动干预自然条件的痕迹。科学家又是置身于具体历史文化中的认知者，难免会受到社会文化中流行信念的影响。卡尔纳普承认，科学家持有的文化信念有时会影响他们判断实验中的相关因素，从而引导科学家对实验结果做出特定的解释。（〔21〕，p. 46）

卡尔纳普能肯定文化因素对科学探究的作用，这和他持有的约定主义思想有关。卡尔纳普1924年发表的阐述物理学因果确定结构与空间结构关系的论文，就深受彭加勒和丁勒（Hugo Dingler）的约定主义的影响。（〔6〕，p. 5）彭加勒的约定主义主张，几何学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实验事实”，而是出于便利的约定。科学家对约定的选择固然要受实验事实的指导，但只要能避免矛盾，那么选择依然是自由的。（〔22〕，pp. 46-47）卡尔纳普对彭加勒的约定主义颇为欣赏，认为其约定主义在承认经验对科学之约束的前提下，比先前的哲学家更强调了“约定的巨大作用”。（〔23〕，p. 59）便利和简单性是选择几何学公理和其它自然科学基本原理的重要标准。便利和简单性的含义，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由逻辑或经验来确定，而是随着历史文化

的演进而不断得到充实。要透彻理解科学家选择约定的根据，显然不能离开科学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约定主义不仅主张几何学公理是人为约定的，还强调科学定律的约定特征。迪昂声称，每个物理学定律都引入诸如质量这样的抽象术语，这些术语是人为约定的符号。每个物理学定律都包含符号的关系，“符号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它宁可说是或多或少充分地选择用来代替它所描述的实在的某种东西”，因而，“物理学定律既不为真，也不为假”，而是“暂定的和相对的”。（〔24〕，pp. 189-195）卡尔纳普承认，在彭加勒和迪昂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意识到“自然定律，特别是物理学理论中的自然定律具有假说的特性”，所有事实经验都具有“开放的特性以及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这使卡尔纳普走向“自由化的经验论”立场。（〔6〕，p. 57）

按照卡尔纳普这种弱化了的经验论，当科学理论的预测与观察结果发生冲突时，科学家至少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拒斥推导出不成功预测的理论句子；第二，拒斥与相关理论冲突的观察报告；第三，修改语言的逻辑规则，从而使观察和理论之间不再存在不一致。（〔25〕，p. 36）既然仅凭经验不足以决定特定科学理论的取舍，那么，就必然有经验以外的因素影响着科学家对实验结果的理解和判断。纽拉特常谈论思想观念的历史背景，强调“哲学概念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卡尔纳普虽然不赞同纽拉特对科学知识过于激进的政治诠释，但他承认，纽拉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思想观念的社会历史条件引入反思的视域，他在和纽拉特的相关谈话中“学到了许多东西”。（〔6〕，pp. 22-24）卡尔纳普对弗兰克的历史研究进路也十分欣赏，他评论道：“弗兰克对历史的爱好以及他健全的常识，使他常常对那些显得过于极端或过于形式化的观点保持警惕。由此，他往往以一种类似于纽拉特的方式，将逻辑学家之间的抽象讨论带回到具体情境的考虑之中。”（〔6〕，p. 32）

很可能是受到纽拉特和弗兰克的影响，卡尔纳普也承认历史文化因素对科学实践有着积极影响。虽然卡尔纳普并未对科学的历史文化因素做过专题性的研究，但他的人文思想为历史主义在科学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得以在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主编的《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发表，就与卡尔纳普的支持有着重要关系。在卡尔纳普写给库恩的两封未公开发表的书信中，他对库恩的科学史研究做出了高度评价：库恩的思想“对所有关注科学理论本性，尤其是科学理论改变的原因和形式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振奋的”。（〔25〕，pp. 19-20）在卡尔纳普看来，库恩的范式理论引出的对科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正是对传统科学形象的极好补充。科学虽然可凭借理性和经验保证其自治，但科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人类活动，科学家仍然会向社会文化汲取创造的灵感和思想养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卡尔纳普虽然欣赏库恩的历史研究，但他显然并不赞同当今社会建构主义对库恩的历史研究所做的相对主义诠释。卡尔纳普在承认科学深受社会文化影响的同时，没有倒向否认科学理性自治的相对主义立场，这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他的科学人生观。

三、卡尔纳普的科学人生观

卡尔纳普的科学人生观继承了肯定人生自主的启蒙精神。启蒙思想家努力把民众的思想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倡导人们凭借理性过一种自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又希望把深受宗教束缚的激情也解放出来。休谟宣称，理性是且应该只是激情的奴隶。启蒙思想家将激情视为人类行动背后的驱动力量，理性无法彻底排除它们。（〔26〕，pp. 180-182）可见，启蒙运动一方面肯定理性在人类自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将理性隶属于激情。激情决定了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价值，科学和理性仅提供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但不足以评价反映个人主观情趣的目的合理性。由此造成一个流行的偏见是，自然科学是一项有理性可循的事业，但在人类社会文化中，却充斥着种种由激情和主观情趣决定的价值，因此，人类的社会文化并不是纯然理性的事业，政治社会信念的改变类似于“宗教皈依”，并不能由理性和科学方法来加以评价。

上述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并进而割裂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既然人类社会文化渗透了非理性的人类价值，那么，为了维护自然科学的理性形象，就需要绝对排除社会政治活动对自然科学的影响。然而，库恩的科学史研究有力揭示了科学的社会文化因素，于是，在一群脆弱的相对主义者看来，科学马上就失去了理性的“纯洁”，变成了一种依靠诡辩和权力的非理性事业。与那些相对主义者不同，卡尔纳普相信，人类的社会文化并不必然是非理性的，而是有进步和落后之分。进步的人类社会是理性的，它由理性自主的个人构成。这些理性的个体在有组织的社会协作下，创造着受理性支配的进步文化。理性与进步的人类社会文化，保障了科学的合理性，而理性与进步的人类社会文化，则源自科学的人生观。

卡尔纳普的科学人生观并不一味主张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卡尔纳普强调，维也纳学派对澄清价值陈述的逻辑性质问题非常关心。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区分了两种价值陈述：绝对的或无条件的价值陈述和相对的或有条件的价值陈述。前者仅仅依据宗教或习俗约定的规范断定某个行为的善恶，而后者则是根据行为趋向的目的和导致的实际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善恶。卡尔纳普认为，第一类价值陈述与经验无关，是没有任何认知意义的形而上学陈述，它仅仅是空洞地在倡导人们应当做某种行为。由于这种道德宣教并没有经验和心理学的基础，因此，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化目的。后一类价值陈述则与经验有关，人们可根据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来判断人类行动的合理性，从而为现代社会构建出合理的人生观。（〔6〕，p. 81）

卡尔纳普承认，不能仅仅根据科学知识确定的事实来决定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科学对人生价值毫无影响。科学虽然无法决定人生追求的目标或价值，但它可以让行动者了解有关人生目标的信息，明确相应行为的后果以及他所追求目标的关系。由此，科学知识与方法能揭示出各种人生价值的潜在矛盾，在一个人追求相互矛盾的人生价值时能向他提出警告，从而使其克制不合理的欲求，前后一致地追求自己最珍视的人生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科学知识和思想也有其道德功效。（〔27〕，p. 369）

卡尔纳普相信，科学有助于一个人自主筹划自己的人生，合理地选择自己的行动，从而过上快乐的生活。然而，与倡导个体快乐的石里克不同，卡尔纳普认为，一个人要真正度过幸福的一生，恰恰不能仅仅关注私人快乐。在马赫与尼采等人的心理学研究的启发下，卡尔纳普指出，“在认识的原始事实即所予中并未出现自我。”（〔15〕，p. 121）自我仅仅是哲学和语言制造出来的虚构实体。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错误地根据这种

虚构的形而上学实体来提出自己的人生主张，反而使自己失去了超越自我的生命力。现代科学研究有力揭露了有关“自我”的形而上学神话，这有助于一个人开拓自身的狭隘视野，冲破私人世界的牢笼，在广阔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文化中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科学给生命赋予神圣的使命，它使生命超越自我，同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8〕，p. 113）一个人的生命固然是有限的，但他若能把个人追求融入到诸如科学研究这样关系整个人类兴衰的伟大事业中去时，他也就把自己的生命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超越了他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为他的人生找到了更强烈持久的动力。卡尔纳普认为，科学的人生观虽然强调个性，但这种个性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他的个性，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有益而健康的关系。这个目标意味着在社会发展乃至最终整个人类的发展中人们相互合作，从而建立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个体都能过上满意的生活，都有可能分享文化的成果”。（〔6〕，p. 9）

卡尔纳普相信，若信奉上述科学人生观的个人都能走下“逻辑的冰峰”，在日常生活中冲破狭隘的自我，将有限生命投入到建设人类文明的无限事业之中，那么，不仅个人将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且人类也会拥有合理而进步的社会。一个合理而进步的社会文化对科学的影响，也将是合乎理性的。作为启蒙精神的继承者和重构者，卡尔纳普相信人类凭借自身的努力，终将建成一个合理而进步的社会文化。所以，虽然他承认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的影响，但并没有陷入相对主义泥潭。可以认为，卡尔纳普对科学合理性和进步性的信念，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之中。

四、结 论

卡尔纳普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和同时代的思想资源，理性重构了倡导人性自律、科学自治、人生自主的启蒙精神，并试图通过统一科学运动全面实现启蒙的人文理想。然而，卡尔纳普科学人文主义追求的启蒙理想，终究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偶然的史实原因。30年代德国法西斯执政，迫使许多维也纳学派的核心成员移民至美国，欧洲统一科学运动随后被二战打断。二战结束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肆虐，在冷战思维支配下的美国政府对卡尔纳普等左翼维也纳学派成员并不友好。有证据表明，联邦调查局（FBI）曾将卡尔纳普列为共产主义的嫌疑犯名单，对其进行过周密的调查和严密的监控。（〔29〕，pp. 271-276）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下，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为了求自保，不得不将自身局限于“概率逻辑”等貌似中立的哲学研究之中，逐渐由社会文化生活退回到“逻辑的冰峰”，并最终导致统一科学在沉默中走向消亡。

另一方面则是深刻的思想根由。卡尔纳普为了捍卫人性自律与科学自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应当说，他的批判对于当时流行的德国唯心论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正如柯林伍德指出，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在好的形而上学与坏的形而上学之间做出区分，而是把所有的形而上学都看做是无意义的”。（〔30〕，p. 198）迪尔沃思（Craig Dilworth）也主张，对科学家群体来说，先验的形而上学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信念，这些基本信念展示了科学家对自然实在的“前科学”理解。形而上学在科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1〕，pp. 1-2）这也在柯瓦雷、伯特与巴什拉等著名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科学的形而上学信念是“前科学”的理解，来源于不同的人文文化，从而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无论逻辑经验主义者是否明确意识到，肯定自然秩序及其统一性的形而上学恰恰是启蒙理想和统一科学得以推进的重要动力。卡尔纳普彻底拒斥形而上学的激进立场，枯竭了统一科学与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泉，反而激起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阻碍了逻辑经验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社会文化抱负。

尽管卡尔纳普的科学人文主义及其对启蒙的理性重建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卡尔纳普的科学人文主义带有“强烈的科学理想主义精神”，它揭示了“科学与人文有着共同的崇高理想”，这种观念即使在今日仍颇有生命力。（〔32〕，pp. 14-15）卡尔纳普重建启蒙文化的尝试，也为促进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对话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肯定的是，在卡尔纳普的科学人文主义中存在大量思想遗产有待发掘。

（参 考 文 献）

〔1〕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 孟建伟：科学与人文主义——论西方人文主义的三种形式（J），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3）。

〔3〕 Friedrich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 Context, Profile, and Development* (A), in Alan Richardson and Thomas Uebe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ogical Empiricism*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Hans Hahn, Otto Neurath and Rudolf Carnap, *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 Der Wiener Kreis* (A), in Marie Neurath and Robert S. Cohen ed., *Otto Neurath,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 (C),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5〕 保罗·蒂利希（尹大贻译）：《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版。

〔6〕 Rudolf Carnap,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A), in Paul Arthur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7) A. W. Carus, Carnap'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 in Michael Friedman and Richard Creat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arnap*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Gottfried Gabriel, Introduction: Carnap Brought Home (A), in Steve Awodey and Carsten Klein ed., *Carnap Brought Home: The View from Jena* (C),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9) Rudolf Carnap, 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A), in A. J. Ayer ed., *Logical Positivism* (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6.

(10) Rudolf Carnap (罗达仁译): 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 (A), 洪谦主编: 《逻辑经验主义》(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年第1版。

(11) Michael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M), Chicago and La Sall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12) Rudolf Carnap, The Task of the Logic of Science (A), in Brian McGuinness ed., *United Science* (C),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13) A. W. Carus, *Carnap and Twentieth-Century Thought: Explication as Enlighten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 Philipp Frank, Ernst Mach and the Unity of Science (A), in Philipp Frank, *Between Physics and Philosophy* (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15) 鲁道夫·卡尔纳普(陈启伟译): 《世界的逻辑构造》(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16) Peter Galison, Construction 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cation of Aufbau (A), in Ronald N. Giere and Alan W. Richardson ed., *Origins of Logical Empiricism* (C).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17) Jonathan I. 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Philosophy, 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2*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 亚历山大·柯瓦雷(张卜天译): 《牛顿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1版。

(19) 李醒民: 论批判学派 (J), 长春: 《社会科学战线》, 1991 (1)。

(20) Carnap, Psychology in Physical Language (A), in A. J. Ayer ed., *Logical Positivism* (C), New York: Free Press, 1959.

(21) R. 卡尔纳普(张华夏、李平译): 《科学哲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1版。

(22) 昂利·彭加勒(李醒民译): 《科学与假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第1版。

(23) Rudolf Carnap,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New York: Dover, 1995.

(24) 皮埃尔·迪昂(李醒民译): 《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25) Michael Friedman, Kuhn and Logical Empiricism (A), in Thomas Nickles ed., *Thomas Kuh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 托马斯·L. 汉金斯(任定成、张爱珍译): 《科学与启蒙运动》(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27) Hans-Joachim Dahms, Neue Sachlichkeit in the Architecture and Philosophy of the 1920s (A), in Steve Awodey and Carsten Klein ed., *Carnap Brought Home: The View from Jena* (C),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28) 孟建伟: 科学生存论研究 (J), 曲阜: 《齐鲁学刊》, 2006 (2)。

(29) George A. Reisch, *How the Cold War Transform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 the Icy Slopes of Log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0) 柯林伍德(宫睿译): 《形而上学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1版。

(31) Craig Dilworth, *The Metaphysics of Science: An Account of Modern Science in Terms of Principles, Laws, and Theories* (M),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32) 孟建伟: 论科学人文主义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 (2)。

(责任编辑 孟建伟)

(收稿日期) 2008年4月16日; 修回: 2009年9月10日

(作者简介) 郝 苑 (1980—) 男, 浙江绍兴人, 哲学博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 科学文化和科学哲学。



Copyright 2001 - 2009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 邮编: 100190

电话: (010)-57552555